

若已有居文集



潘文彦著

上海书画出版社

甲子年陈延南



慧禅 主编

上海云翔寺文化书系

上海人民出版社



若已有居文集



潘文彦著

文彦书系

田中陈延甫



慧禅 主编

上海云翔寺文化书系

上海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若己有居文集/潘文彦著.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9

(上海云翔寺文化书系/慧禅主编)

ISBN 978 - 7 - 208 - 08538 - 1

I. 若... II. 潘... III. 佛教—文集 IV. B948 - 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061550 号

责任编辑 杨柏伟

装帧设计 光大设计公司

美术编辑 杨德鸿

· 上海云翔寺文化书系 ·

若己有居文集

慧 禅 主编

潘文彦 著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 ewen. cc)

世纪出版集团发行中心发行

上海华业装璜印刷厂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890 × 1240 1/32 印张 12.75 字数 300,000

2009 年 6 月第 1 版 2009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 - 3,250

ISBN 978 - 7 - 208 - 08538 - 1/B · 739

定价 48.00 元

总序

一、正确认识佛教

佛教是世界三大宗教中最早出现的宗教，它产生在印度，发展在中国，已有二千五百多年历史。是两大东方文明古国的思想结晶，起初只在亚洲流传，现已遍及全球。据上世纪八十年代统计，全球佛教徒约有六亿人。佛教作为世界性的宗教，是当今社会的一种不可忽视的意识形态。

二千五百年前，释迦牟尼创立佛教时，反对婆罗门教的梵天创世说和种姓制度（种姓分四：婆罗门、刹帝利、吠舍、首陀罗。种姓之间不能通婚，不能交往。后来又分出社会地位更低的“贱民”），他主张众生平等，否定创世主的存在，提倡无神论。但是，印度佛教在后来演变发展过程中，释迦牟尼逐渐被神化，特别是六七世纪时期，印度兴起密教思潮，终于将印度佛教改造成为神秘的宗教。

佛教传入中国之初，中国人用神仙方术去理解和接受佛教，将佛看成神。二千年来，佛教在中国走过了初传期、发展期、鼎盛期、衰落期四个阶段，经历了神学化、人学化、经院化和世俗化四个历程，佛教终于从神坛走向人间，从超世脱俗来到现实世界，可以说，印度佛教和中国佛教的演变

过程,走的是两条截然相反的道路,前者是由人学蜕变为神学;后者是神学化走向人学。

实际上,真正的佛教就是人间佛教。唯有人间的佛教,才能表现出佛法的真义,佛教才有生机,才有活力,究竟彻底而又最适应现代机宜。释迦牟尼在人间创立佛教,那么,佛教本来就应该是“人间”的。所以,佛在人间,觉悟在人间;佛法也在人间,佛法即是佛在人间的教化。教化不是宣传,宣传是灌输,教化是启迪智慧。

佛教对待宇宙人生的态度,既不是唯物论者,也不是唯心论者,更不是唯神论者。我们说佛教不是唯物论是显而易见的,《心经》说:“色即是空。”《金刚经》说:“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大般若经》六百卷,总括一句话:“诸法性空。”诸法,即一切主观事物和一切对于这事物的认识。性空,即万事万物从本质上说都是不真实的、虚假的,在认识上是“不可得”的、“无所住”的假相。我们说佛教也不是唯心论,这里必须说明“唯心”的概念。佛经所说“三界唯心,万法唯识”,这里说的唯心与西方哲学上(也就是当代哲学上)所说的唯心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当代哲学家们所说的唯心,在佛学里称为意识,而佛教所说的唯心是见分和相分的统一体。详细论述可参读唯识学。至于说到唯神论,前已述及,佛陀是人世间的觉悟者,不是创世主。在创建佛教的当时,就反对婆罗门教的梵天创世说。佛陀不是世界的主宰神。在佛教里很明确地认为,佛是觉悟(指大彻大悟)

了的人，凡人只是尚未觉悟而已。即所谓圣凡不二。所以正信的佛教徒应是无神论者，这一点，西方的宗教界、哲学界都认为佛教是无神教。

佛教的理论是因缘和合的缘生论者。佛教认为：世界上所有种种的、物质的万事万物都是因缘和合而生。譬如种瓜得瓜，种豆得豆，植下去的瓜种子、豆种子就是因，这在佛教里称为亲缘因，属平等因，是根本；而水土、光照、温度、肥料就是缘，佛教里称为增上缘，是条件。可参看《百法明门论》，由此出发，也就是可以推定世人皆知的因果律。善因结善果，恶因结恶果。这在佛教的唯识学中有详细而透彻的论述，唯识学是一门心物结构的学说。

佛教就是以这样的态度来分析历史，考察世界的现实，认为宇宙人生就是如此的无始无终，因果相续，因缘合则生，因缘散则灭。我们就应该也能够把心量放到无量无边的大，与真如世界相契合，与天地精神相往来，破除法执和我执，真正领会宇宙人生的真谛，而达到“无我”的境界——佛的境界。佛，就是觉悟者。这就是佛教全部理论中的核心要义。

诚然，世界是不断变化的、无常的，佛教认为无常即常。佛教所想实现于现实世间的，就是本着彻底而完善的正觉，适应时机，随顺当时、当地、当机，无不恰到好处。否则，实现于人间的佛教，就会成为一种空论、一种玄想。佛教讲得最多的，论述得最多的，而又最为世人误解的“空”，也就是空去我执的烦恼障和空去法执的所知障，并没有否定世间

万象的意思，正是把我执、法执的斥除过程，始终置于人生世间。如果离开了人生世间，人生就难以觉悟，信仰也就失去了生命。依照这种世间觉悟的思想观念，当今人间佛教就可以其人道慈悲的宗旨，契合众生的心灵，以整个时代为当机，着眼于现代社会，可以科学的、理性的、民主的、平等的身相，呈现于佛教。这不仅符合佛教菩萨四摄法道的精神，也是人间佛教得以践履的正途。

二、佛教对中国文化的影响

从广义上说，佛教对中国来说，是一种包涵方方面面的，内容丰富而精彩的外来文化。当然，文化是不能封闭的，也不应该封闭。两种不同性质的文化一旦相遇，就会碰撞、交汇、激荡、融合而产生出新的令人耀眼的光辉。像其他任何外来文化一样，佛教也一定要同中国的国情相适应，才能得以在中国植根、生长、演化，而有成果。佛教的文化在中国二千年中，已经融入中国传统文化，成为不可分割的有机部分。作为历史的载体，今日回顾，仍然可以在传统文化的各个时期，各个领域，明显地观察到佛教的印痕，不少方面，可以看到其影响是根本性的。

文学方面，中国的古典名著，不论是分分合合的《三国演义》，或是英雄聚义的《水浒传》，《西游记》当然更不必说，或者是官宦人家豪门宅第的《红楼梦》，以及志怪小说、民间话本，虽然是题材各异，大都充满佛教的义理。因为优秀的文学必须获得对生活对人生的真正理解，肤浅的喜怒哀乐是

没有什么意义的，我们不能仅仅拘于文学是情感的表现的机械命题，而忽略了文学还须蕴含人生哲理，和反映时代的历史责任。

同样，唐人诗歌由于大量蕴含哲理的佛门诗偈的涌入，推动了哲理诗的发展，一扫伤春悲秋的愁绪，出现大量禅诗，留下一片清凉世界，人间处处皆净土，大大拓展了新的审美领域，被文学史称为诗歌的革命。

在美学上，无论是绘画、石刻、彩塑，佛教艺术给我们留下无与伦比的辉煌艺术珍品。闻名世界的敦煌莫高窟、天水麦积山、山西大同云冈、河南洛阳龙门、四川大足以及精致非凡的承德外八庙，这些艺术珍品是佛教洒落在中国大地上一点点璀璨的瑰宝，它们的艺术风范，是后人无法企及、也难以模仿的。如果我们再一次聆听这些古老艺术珍品遗迹的倾诉，我们会受到惊心动魄的震撼。对于现代艺术界来说，这是历史的珍品，从中有可以借鉴学习的无穷的宝藏。

在哲学思想上，佛教在中国的发展时期，与南北朝时期的玄学相结合，成为中国意识形态领域中的哲学思潮，到了宋明理学的发展，佛教从神坛走向人间，而与儒家的伦理哲学合一，成为儒化的佛学，直到清末民初，一批思想家，社会改革家，时代精英，首先选择了佛教，如康有为、谭嗣同、梁启超等。很明显，康有为的《大同书》所依即是佛教四谛说，谭嗣同的《仁学》，被人称为“应用佛学”，用的是华严宗圆

融无碍，一多相容的教理。梁启超，堪称近代大思想家，著名学者，他对佛教专著很多，他明确指出：“佛教信仰乃智信而非迷信，乃兼善而非独善，乃入世而非厌世，乃无量而非有限，乃平等而非差别，乃自力而非他力。”并以此六大特征，表明佛教的积极性，可以救国救民救心。明确表示，“舍己救人之大业，唯佛教足以当之。”当时及其后的一大批志士仁人，都十分赞赏大乘佛教“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救世精神。“五四”大潮过后，更多文人（恕不一一列举）反观佛理，进行深刻的思索，在寻求中国文化建设的新路，知识分子信奉佛学，也是因为他们意在以佛家思想作为他们构筑自己哲学思想体系的基础。

综观上述诸多方面，可见：

佛教是一种思想，一种正大光明，教化人类净化心灵，创建人间净土的思想；

佛教是一种信仰，一种具有永久性、普适性和必然性的正确信仰；

佛教是一种道德。“不为自己求安乐，但愿众生得离苦。”“地狱未空，誓不成佛。”“无缘大慈，同体大悲。”可以说是世界上具有大无畏自我牺牲精神的最崇高的道德。

佛教是一种文化，传承着两大文明古国基因的、蕴含着丰富多彩的、充满活力的、契应时代精神的文化；上世纪大科学家爱因斯坦这么说：“如果世界上有一种宗教能够解答科学上提出的问题，这个宗教一定是佛教。”

佛教是一种哲学，被恩格斯称为“佛教处在人类辩证思维的较高阶段上”的哲学。

三、文化兴教，文化兴寺

一个没有文化的民族，必定是落后的、愚昧的，无法以自强跻身于世界民族之林。同样，一个没有文化的宗教，也必定是愚昧的、落后的、迷信的。或者虽有一时的兴起，但必不可能发展壮大，成为全球性的大宗教。佛教创立二千五百年来，历尽磨难，却越来越发展。如今已赢得全球六亿多人的信仰。信仰必须有理论做支撑，要建立在认识深邃的理论基础上，信仰才坚定不移，才是永久性的。缺乏理智之魂，易于激动，易于盲从，易于迷信。我们要理性地看待佛教，理性地看待宇宙人生，理性地看待当今社会，用人间佛教的理念，观照世间，在净化自身心灵的同时，为净化社会，为建立理想的人间净土作出贡献。因此，人间佛教必须提高自身的品格，必须提倡佛教的正知、正见、正解和正信。

鉴于上述原由，云翔寺计划组织有识之士，共同编撰有关佛教文化系列丛书，初步拟订为：

一、佛教人物传记，历史上的高僧大德的大无畏坚毅求法弘法精神，以此激励后人，作为我们学习的榜样；

二、人间佛教的教义教理，兼顾普及和提高，在弘扬慈悲精神的前提下，契合当今社会现实，用“当相即道”的理念，从现代的人生化、社会化、理性化为基础，修持人间佛陀，实现我们的目标——人间净土；

三、云翔寺创建已经一千五百多年，历史上曾经大有建树。因地处南翔，属上海嘉定地区，所以有关嘉定地区的佛教遗迹，佛教掌故，民间传说，作为我们丛书的又一个方面，出版一些趣味性和可读性较强的通俗读物。

我是僧人，深知要兴教，必有赖于文化，要兴寺也必有赖于文化。但毕竟所知有限，识见浅陋，愿望虽如此，付诸实施困难多多，丛书陆续出版中有望高人不吝赐教，诸多方面同仁惠予指正，这是我衷心祈盼的。

佛历二五五一年 岁次丁亥 佛成道日作

惭愧僧 慧 禅

从容睿智的觉者

——读《若已有居文集》

文彦老师是我尊敬的一位长者，有幸认识他，已是二十五年前的事了。在这二十五年不算太长、也不算太短的日子里，我在事业上受到他的提携，工作中受到他的帮助，生活上也受到过他的关爱。

为一位尊敬的长者著作写序，这是一件惶恐的事情，况且这是一位从容淡定而又充满睿智的长者。于是乎，考虑再三，终于不敢在智者面前卖弄文墨，只能就大著中的三卷文字，为读者说一点我所经历的往事，介绍一些我所知道的史迹。

卷之一“丰门立雪”是文彦老师对丰子恺先生的怀念文字。文彦老师结识丰子恺先生是在1957年春，尽管他当时还是上海交通大学电力系的三年级学生，丰先生仍是收下了这位爱好文学的学生。师生关系确立后，文彦老师与丰先生交往频繁，感情日深。尤其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丰先生受到了无端的陷害，一般人不敢再与之亲近，而文彦老师却会利用每次回上海的机会主动去丰家陪伴丰先生。丰先生逝世后，文彦老师陷入了沉思：怎样才能向后人介绍丰子恺先生？怎样继承发扬丰子恺的艺术事业？他后来终于发了一个愿：编撰《丰

子恺先生年表》。须知，当时“四人帮”尚未垮台，加上经过近十年的动乱，整理收集丰子恺的生平资料实在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文彦老师在回忆这段经历时是这样概括的：“彼时实为环境所不许，工作迟迟未能有所进展。秋风萧瑟，梧桐叶凋，一年辛苦，检点所作，仅书卡、编目、文摘而已。”正当文彦老师为此忧心忡忡之时，传来了粉碎“四人帮”的喜讯。于是他大喜过望，多方奔走，先后访问了刘海粟、刘质平、吴梦非、丰一吟、胡治均、裘梦痕、沈本千、陈瑜清、田雪庵、郑晓沧、丰桂、于梦全等一大批丰先生的亲朋好友，终于基本梳理出了丰子恺的生平线索，并于1977年着手整理、汇编成册，又自己动手刻印，多方征求意见，再作修改。1978年秋，弘一大师的弟子、丰先生的好友广洽法师从新加坡再度来华时，文彦老师将修改后的《丰子恺先生年表》赠送给广洽法师。广洽法师读后十分高兴，特意带回新加坡，并出资于1979年5月在香港出版，一时掀起了一股丰子恺研究的热潮，仅在香港，评论这份年表的文章就有二十余篇。限于时代和条件，文彦老师编撰的《丰子恺先生年表》并非尽善尽美，但是我们应该感谢他为丰子恺研究所作出的无可替代的贡献。他的拓荒性工作，自有其特殊的意义。而对于文彦老师个人来讲，这份年表的出版，也表达了学生对老师的无限敬意。至于文彦老师与丰先生的交往详情，“丰门立雪”中的文字自有具体描述。要补充的是，文彦老师是1984年8月19日成立的丰子恺研究会最早的十一位会员之一。我与他的交往，也就是

从那个时候开始的。文彦老师善良且善解人意，他知道我当时还是一个刚大学毕业且有志于研究丰先生的穷教师，故经常主动地提供研究资料，给我看他收藏的丰先生的书画遗墨。我在上海查访史料时住不起旅馆，文彦老师还让出自家的房间供我寄宿。长者的关爱，至今铭记于心。

卷之二“觉海拾贝”记述的是文彦老师的佛门因缘。我与文彦老师交往后很快就发现他的文笔很好，虽然他是一个学工科出身的人。随着与他交往的深入，我又发现他有一副极具思想性的头脑。他很聪明，也很有学问。退休以后，他较多的时间从事佛学研究和文化演讲。请他讲课的单位很多，而且还经常走出国门，到新加坡、菲律宾等地讲学。虽然文彦老师自谦“我只是在觉海边上漫步的老人，涉足一湾浅浅的海水，初尝清凉的海风，拾到几枚散落在沙滩上、但瑰丽无比的贝壳……”其实，文彦老师对佛教的认识是很深刻的，并能够参透佛学的真谛。且看他的几段体悟：“佛教主张平等，众生平等，圣凡不二。”“学佛的核心是觉悟。‘自性迷，佛即众生；自性悟，众生即佛。’前念迷即凡，后念悟即佛。”“宇宙是时空概念的组合，是人类生活的环境。佛教认识宇宙和人生中没有主宰神的存在。佛教不是唯物论，也不是唯心论，当然，更不是唯神论。佛教是缘起性空的缘生论。通过五蕴三界的世间网络，显示出宇宙万法的实相真如。”事实上，文彦老师已在2001年皈依了瑞今老法师，是一位三宝弟子。退休后在许多佛教寺院里能够看到他的身影，他参与佛教活动、

协助编辑佛学读物、发表学佛心得，如此等等尽显一位觉者的形象。记得在2000年6月底，他邀请我到上海玉佛寺参与过该寺“弘一图书馆”的开馆仪式。那天在他的安排下，我有缘在寺中住过一夜，也算体会了一回寺中的佛教气息。在我的感觉中，文彦老师是一位人间佛教积极的拥护者、实行者。写到这里，我忽然想起丰子恺先生当年陪同弘一大师参观上海佛教居士林后所说的一句话：“于此我才知道居士是佛教的最有力的宣传者。和尚是对内的，居士是对外的。居士实在就是深入世俗社会里去现身说法的和尚。”对于像文彦老师这样一位觉者和智者，我以为以他的身份委实对佛教事业做了大量实事，本卷中的文字即是最好的例证，功德无量。

卷之三“福慧慈济”记录的是文彦老师跟随香港慈善老人严宽祐先生七年之久的从事慈善事业的经历。严宽祐先生是香港福慧慈善基金会董事会主席，自1995年起，他和他的基金会同人在中国内地进行了广泛而持久的慈善事业。严老是一位虔诚的佛教徒，很早就皈依佛门，且在他的经历中无数次为佛教事业作出了特有的贡献。他青壮年时在香港经商，曾有一段时期还是与目前的香港首富李嘉诚先生在经商业绩上难分伯仲的商界弄潮人。在严老经商最成功的时候，他居然令凡人难以理解地隐居美国，复又开拓当地的佛教事业和慈善事业，休斯顿市政府向他颁发了荣誉公民暨亲善大使证书。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中期，严老开始在祖国大陆从事慈善事业，尤其注重助学支教。为了实现他的理想，就在

1997年香港回归祖国、一些持犹疑态度的人离开香港之时，严老居然从美国返回香港，并成为香港的永久居民，还成立了福慧慈善基金会——香港回归祖国后成立的第一家面对祖国教育和公益事业的慈善机构。此后，严老不辞辛劳地奔波于祖国的大江南北，扶贫济困、问寒问暖。被他资助过的人，数量之多、分布地域之广、持续时间之长，都是令人慨叹、众口赞誉的。一位哲人曾说过：人生最大的极限是智慧，可以“见到因缘，顿悟无生”；人生最大的极限是慈悲，可以“无缘大慈，同体大悲”；人生最大的极限是发心，可以“头目脑髓，供养十方”；人生最大的极限是成佛，可以“了脱生死，圆满人生”。一个佛教徒学佛修行，就是在向最大的人生极限迈进。在这方面，严老可谓积极的实行者。严老的行动感染了许多人，文彦老师就是其中突出的一位。福慧慈善基金会在上海设有通讯处，文彦老师是负责人之一。多年来，他奔走东西，不辞辛苦，参与了基金会众多的慈善行动。我印象最深的一件事是：1998年夏，中国发生了百年未遇的特大洪涝灾害，南北各主要江河均发生了严重的洪水，其中尤以长江流域为最，而在长江流域诸省市中，又以湖北的情况最为紧急。严老获知灾情后，为济燃眉之急，他首先于8月13日委托香港国华商业银行电汇5万元美金到上海通讯处，要求同人分批转至湖北，以购买粮食、药品、衣服等救济灾民。文彦老师是受严老之托前往武汉救灾的人。为此，文彦老师有《武汉三日》一文，文章首先从宏观上描述了当时的景况：“《孟子·滕文公

下》：‘昔者禹抑洪水而天下平；周公兼夷狄，驱猛兽而百姓宁。’中国人素来以‘洪水猛兽’比喻极大之灾祸。今年长江洪峰，先后八次之多，汹涌程度，为百年所未遇。这不是比喻，这是真正的祸害。武汉为华中重镇，乃长江与汉水汇合处。人口七百多万。武昌之文化区、教育区，汉阳之工业区，汉口之商业区，其发展早在辛亥革命以前。今年受到特大洪峰直接威胁，其江海关水位已超过历史最高水位四十五天，最高峰时曾达 29.45 米（警戒水位 26.3 米，紧急水位 27.3 米，危险水位 28.28 米）。”就在这种情况下，文彦老师来到武汉近郊地势最低的湖心农场时，看到积水已有一米多深。由于长江洪峰未过，内涝不得外排，该农场已被污水浸泡了三十天。农场里有湖心小学，小学里有一座教学楼，建于“文革”年代，本来质量不好，加上洪水浸泡，现已成危房。这所学校有二百六十五名学生、三十三名教师。教学楼虽已是危房，但在受灾的时候，学生上课、教师授课仍须坚持在情况稍好的西侧教室里。为了能让学生有一个起码的学习环境，文彦老师向所在区区长转达了严老愿意助建小学的意向。经过协商，福慧慈善基金会出资十万元，区政府出资十万元，农场斥资三万五千元。其余以义工形式完成。双方商定后，立即鉴定了意向书。此校建成后被命名为福慧培英小学。在湖北监利县，这里的学校已是名副其实的帐篷学校了。为了确保武汉，政府决定在长江武汉上游地段实行分洪。为了舍小家，保大家，监利县首当其冲，长江在该县开了八个口子，十万居民，家园